

# 诗史之际

## 唐代文学发微

◆ 李浩 著



家藏  
接  
上  
下  
如  
在  
河



商务印书馆

# 诗史之际

——唐代文学发微

李 浩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0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史之际:唐代文学发微/李浩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ISBN 7-100-03165-6

I. 诗… II. 李…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唐代—文集 IV.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 第 36274 号

**西北大学“211 工程”资助项目**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SHĪ SHĪ ZHĪ JÌ

**诗 史 之 际**

——唐代文学发微

李 浩 著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165-6 / G·420

---

2000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0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3/4

定价:18.00 元

# 序

霍松林

李浩教授治学勤奋,视野开阔,实力雄厚,是学风严谨而又勇于开拓的青年学者。这部《诗史之际——唐代文学发微》,是继《唐代园林别业考论》、《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等专著之后的又一力作。全书分为综论、分述与考异三部分,前两部分侧重从理论上进行概括,在史实中求史识;后一部分是对文献典籍的稽检订正,侧重于考索之功。而文史结合、诗史互证,则是全书最基本的特征。

《山水之变——论先秦至唐代山水自然美观念的嬗变》一篇勾勒出先秦至唐代山水自然美观念演化的美学指向与历史流程,并清理了山水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为解读山水田园诗的盛唐文本提供了话语背景。《论唐代关中的文学士族》一文,一反视关中士族为一武质集团、武则天后已消亡殆尽的权威说法,展现了关中士族由文向武、又由武向文的演生变迁过程,在学术界第一次对唐代关中士族这一地域文学群体从纵横两条线索进行定位。《论唐代关中士族与教育》则一反中国教育史和隋唐文化史研究的流行观点,指出唐代关中士族重视教育,家族教育极兴盛,尤其强调文学教育,遂使教育史研究与文学的诠释有了必要的关联。《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一文,对由陈寅恪先生提出并在当代隋唐文史学界有重要影响的观点提出质疑与商榷,指

出牛李党争中两派主要成员的郡望分布具有极突出的地域特征，李党成员主要是山东郡姓士族，牛党成员基本上属关陇士族。牛李党争并非是士族与庶族之争，而是士族之间的“圈内之争”。而切入问题的视角是士族郡望，研究方法则是实证与统计，故此项成果无论方法与结论均显得异乎寻常。其他如《苏绰文体改革新说》、对魏周时期的文学复古活动翻案重估；《〈全唐诗〉校读札记》、《〈皇唐玉牒〉编撰者之重新检讨》、《唐代园林别业杂考》、《唐人叠石小考》等或发覆探赜，或拾遗补阙，或提出问题，或自创新说，详他人所略，订流行之讹，对于唐代文史研究者或有助益。

注重精研原始文献与关注最新成果是本书的突出特点，如《唐代园林别业杂考》指出《唐两京城坊考》误认为永宁里有窰巩宅园，宋敏求《长安志》、骆天骧《类编长安志》中“白雨亭”为“自雨亭”之讹；《全唐文》卷八七二李徵古《庐江宴集记》中“乾贞己酉岁”之中“己酉”，乃“己丑”之讹；《唐人叠石小考》中据唐代诗文笔记指出园林史界谓唐人“理石”只有置石而无叠石之说实误，皆为细读精研原始文献所得。作者同时还非常留意海内外唐研究的最新成果，凡所征引，皆有所标注，既注重学术规范，又使自己的结论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之上。

注意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相结合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陈寅恪总结王静安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之一便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利用出土文物研究文史，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如敦煌学、吐鲁番学、西域研究、变文研究、唐五代词研究等。但是从事古代文学的青年学人对此问题仍未能有足够重视。实际上，地下文物也是一种广义的文献，如《金石萃编》、《千唐志斋藏志》、《唐代墓

志汇编》等。本书中《“关中郡姓”论题之辨析》一文,即从周绍良先生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册检到李衡《唐绛州闻喜令杨君故夫人裴氏墓志铭并序》,说明裴氏“与韦柳薛,关中四姓焉”,参之刘禹锡《薛公神道碑》,来理解《新唐书》卷一九九引柳芳《氏族论》的论述,许多疑点涣然冰释。在《唐人叠石小考》一文中又据唐代出土三彩假山与宅院建造模型,同诗文笔记相结合,使结论更加可信。

注意将历史学、地理学与园林史的成果与方法运用到文学史研究中,是本书的另一个特点。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学术传统以贯通和整合为其最主要的精神。经、史、子、集虽分为四部,四部之内又各有千门万户,但是所有部门都呈露中国文化的特性,因而也都可以互通(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钱先生主要讲“专家”与“通儒”的关系,但就文学史研究而言,四部也是可以打通,相互结合的。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者,仅读集部的书是不够的,还应读史部、子部、经部的书,这样,对古代文化、社会、制度才能有一个整体印象,不致于以偏概全。文学史研究不仅要有纵向的“通识”,而且要注意横向的“通识”。本书对园林别业景观的辑佚考证,对地名与地域文化的留意,均涉及园林学史与历史地理学,其中对空间地域因素的强调与突显,更使作者的研究有几分独特与新颖。

作者融揉谱牒学、统计学、精神分析学、艺术美学的研究路数而为历史——文化综合研究,不仅具有方法论的特点,而且拓展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

本书的不足之处是:对文学自身的研究尚不够深入;书中各篇在范畴概念的使用上,前后有不一致处;全书系统性体系性不强;

#### 4 诗史之际

某些结论,论证还不很充分;但从总体上看,则颇多创获,希望它早日问世。

2000年8月18日于唐音阁

# 目 录

|         |     |
|---------|-----|
| 序 ..... | 霍松林 |
|---------|-----|

## 综 论 篇

|                     |    |
|---------------------|----|
| 山水之变——论先秦至唐代山水自然美   |    |
| 观念的嬗变 .....         | 3  |
| 论唐代关中的文学士族 .....    | 16 |
| 唐代关中士族与教育 .....     | 43 |
| 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 ..... | 66 |

## 分 述 篇

|                      |     |
|----------------------|-----|
| 苏绰文体改革新说 .....       | 85  |
| 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自然特征 .....  | 108 |
| 王维与孟浩然诗之比较 .....     | 131 |
| 李白诗文中的鸟类意象 .....     | 148 |
| 李白作品中的“梦” .....      | 162 |
| 李白作品中的园林文化 .....     | 175 |
| 柳宗元古文思想与关中学术资源 ..... | 19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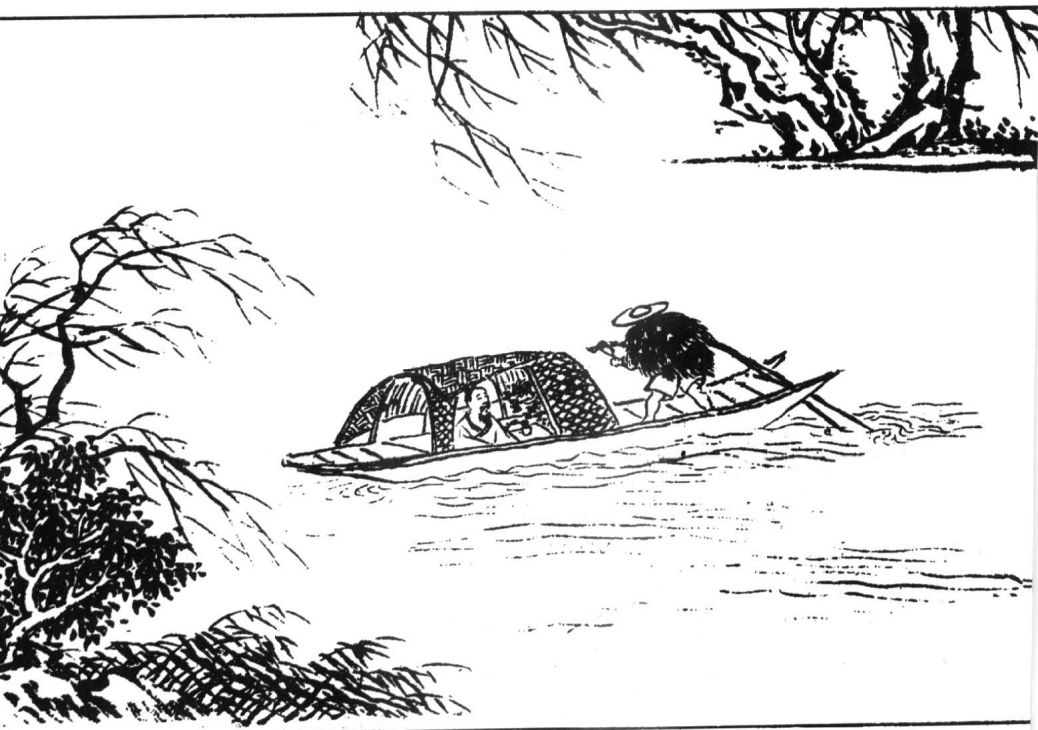
## 考 异 篇

|                      |     |
|----------------------|-----|
| 《全唐诗》校读札记 .....      | 219 |
| 《皇唐玉牒》编撰者之重新检讨 ..... | 233 |

## 2 诗史之际

|                                      |     |
|--------------------------------------|-----|
| “关中郡姓”论题之辨析 .....                    | 242 |
| 唐代园林别业杂考 .....                       | 250 |
| 唐人叠石小考 .....                         | 262 |
| 孟浩然交游补考 .....                        | 272 |
| 范碑所述李白世系的谱牒学问题 .....                 | 282 |
| 释“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从杜甫<br>《赠韦七赞善》谈起 ..... | 296 |
| 柳宗元婚配与子女考 .....                      | 303 |
| 窦叔向家族贯望新证 .....                      | 314 |
| 后记 .....                             | 333 |

# 综 论 篇





# 山水之变

## ——论先秦至唐代山水 自然美观念的嬗变

人与自然的关系式中均含有变量。一方面,人类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影响、征服和改变着异己的原始蛮荒的自然界,使自然打上人的烙印,成为人化的自然。另一方面,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对自然的態度。正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不断变化着的关系,才使自然由巫术礼仪、宗教祭祀的对象,由伦理道德的比附和象征,转变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而人对自然的態度,也有一个从宗教態度到功利態度(实用功利和精神功利),再到审美態度的转变。在中国艺术史上,这种转变的历史流程经过了一千多年才得以完成。本文试图勾勒出先秦至唐代山水自然美观念变化的历史流程与美学指向,并在此背景上澄清山水文学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

### 一

先秦典籍中所记载的“望秩于山川”、“山川之望”、“望祭”,实即人们在原始宗教观念作用下的自然崇拜仪式。《尚书·舜典》:“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诗·大雅·时迈》:“怀柔百神,及河乔岳。”

都是把山川当鬼神一样来祭祀。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说：“望者，遥望而祭山川也。”此时，高山大川还不是审美对象，而是人们顶礼膜拜的神物。人们在登临眺望时，所获得的也不是愉悦身心的美感享受，而是庄严肃穆的宗教情绪。其次，这种活动是最高统治者和诸侯贵族少数人祈福禳灾的仪式，而不是普通的观赏游乐活动。秦汉以来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举行的“封禅”活动，实即受“望祭”仪式影响而形成的最隆重的国家典礼。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逐渐脱离蒙昧，发现自然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诗·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便是对大禹治梁山、除水患的歌颂，禹所说的“予乘四载，随山刊木”（《尚书·益稷》），也反映了人们征服山川的智慧与成就。《荀子·王制》中从人与自然的物质功利关系出发，认为：“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天地万物之所以美，是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舟楫之利，财用之源，反映了自然从“神化”向“人化”的转变和过渡。

除了认识到人与自然的这种实用功利关系外，人们也感到了自然与人的精神生活的密切联系，自然对人的道德精神的象征与暗示意义，于是产生了“以物比德”的观点。“比德”说最早见于《管子》，管仲认为禾“可比于君子之德”。《论语》中所说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等，都是从伦理道德的观点去看自然现象，孔子还曾明确指出：“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刘宝楠《论语正义》引）比德，即用山水的自然特性来比拟人们的美好德性，把自然景物与人们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将山水看作是人的某种道德品质的表现和象征，看作人的某种精神拟态。“比德”说第一次揭示了人与自然在广泛的样态上可以互相感应交流的关

系,在美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诗经》中描写景物,或状桃花之鲜,或尽杨柳之貌,或拟雨雪之态,以少总多,情貌无遗,古简浑成,对后世影响极大,但多为比兴发端之词,即景物是情感的媒介与陪衬,是人事活动的背景,这种写法即受比德思想的影响。《楚辞》写景比《诗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瑰怪之观,淡远之境,重沓舒状,曼长流利,情韵悠悠。但总的说来,仍然是景为情役,而非独立自在,如《橘颂》虽通篇状物,但句句都是拟人,《离骚》中的美人香草,恶禽臭物也都具有比兴之义,与“比德”说的关系亦甚为密切。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构成自然界的美的是使我们想起人来(或者,预示人格)的东西,自然界的美的事物,只有作为人的一种暗示才有美的意义。”<sup>①</sup>不难看出,车氏此论与“比德”说有相同之处。它们都从社会性角度理解自然美,注重自然的象征意义,但又都忽视了自然美的形式特征和自然属性,忽视了人对自然具体生动的审美感受。同时,对象征与暗示意义的强调发展到了极端,就易流于简单的比附,如汉儒将自然景物与政教国运相比拟,就显得牵强,将自然现象的变化与瑞应凶兆相联系,就更荒谬了。“比德”说的这种缺陷,在庄子思想中得到了补充和矫正。《庄子·知北游》中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这种“乐”并不是以自然山水为道德伦理的象征,而是外物触发起的具体感兴,是一种直观的愉悦和满足,与孔子所说的智者、仁者之乐很不相同。这种认识,较之于“比德”说,是对自然的一种更为纯粹的审美感受。但这种思想在先秦两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只有在魏晋玄学出现后,才重新为人们所重视,被引申发挥,成为整整一个时代“悦山

①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中文版,第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乐水”的思想根源。

## 二

魏晋以来,社会现实的动荡不安,促使主体自然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就对自然美的认识而言,包含着两个层次的理论意义。首先是指理性的觉醒。玄学和老庄泛神论体系关于“天道自然”理论的重新认识与阐发,冲破了两汉谶纬神学和烦琐经学的桎梏,廓清了长期蒙在山水上的神秘灵怪和政教比附的迷雾,成为促使人们领悟自然美的契机。其次是感性的觉醒。生命的短暂,使人们更珍惜现世生活,最大限度地提高生命密度的利用。社会的黑暗,又使人们无法通过建功立业的途径实现个人价值。于是,汲汲顾影,游放山水,属耳流目,极视听之娱,在苦难悲惨的现实之外追求片刻的快适愉悦,与先秦儒家否定或轻视耳目视听的感官娱乐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因此,被扭曲的自然形象得以拨正,合理的感性追求第一次被充分肯定。这是思想的解放,同时也是自然的解放。

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层次性的逐步展开,山水也由人们赖以谋生的致用之所和取资之源,由个人品德和社会政教的比喻与象征,一跃而为独立的审美观赏对象。在诗歌中,山水原来仅作为人事的背景衬托、比兴发端的媒介,物色多而景色少,片断局部多而通篇整幅少,虚构想像多而记实写真少,此时则变为身历目见的观赏和描写对象。朱光潜先生说:“兴趣由人事而移到自然本身,是诗境的一大解放,不特题材因之丰富,歌咏自然的诗因之丰富,即人事诗也因之得到较深广的义蕴。”“所以……是

诗的发达史上的一件大事。”<sup>①</sup> 登临赏玩名山胜水,不仅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而且用自己的感官领略到了山容水态,鸟语花香,获得了与井邑都市旨趣大异的快适和愉悦感,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自述:“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羊祜镇守襄阳时,“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岷山,置酒言咏。”(《晋书·羊祜传》)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此外,如曹操的碣石观海,七贤的竹林放性,石崇的金谷邀游,王羲之的兰亭聚会,陶渊明的采菊东篱,都是一时盛事,千古佳话。左思《招隐诗》其二说:“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山水胜过了丝竹,自然胜过人为,在诗歌史上,这确实是破天荒的新发现,它预示着诗歌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田庄环境的园林化,是晋宋以来庄园地主和贵族文士生活的一大追求,选择山水佳境营建别墅池馆,或在田庄内造园构景,这样就可以使远近胜概,历历在目。西晋的谢安、石崇、潘岳,东晋的王羲之、许询,刘宋时的谢灵运都有著名的别墅园林。就经济实质而言,这些当然都是庄园主侵占山林川泽,实行封闭的自然经济的结果,但从诗歌创作的生活积累角度来说,却对文士诗人熟悉热爱园中的峰林泉石,进一步观察发现山水自然美,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园林一方面可以实用居处,另一方面又可观照自然,不仅可以观赏园内的微型山川,袖珍林泉,而且可以通过“借景”的造园创作方式,观赏礼赞园外大自然<sup>②</sup>。

① 朱光潜《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见《中国比较文学》第1期,第40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

② 园林与文学的因缘关系,参见拙著《唐代园林别业考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一书的有关论述。

关于自然山水对人的作用,在此时也有许多新的探讨,王羲之《兰亭诗序》中说:“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张华《答何邵诗》:“属耳听莺鸣,流目玩儵鱼,从容养馀日,取乐于桑榆。”谢灵运也说:“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这种娱乐,既不同于获得某种物质享受时的满足,又不同于道德追求时的欣慰,更不同于宗教礼拜时的迷狂情感。这是物的感性形式作用于人们的视听感官所产生的愉悦身心的快感,即美感。晋宋以来,文士诗人雅集,喜欢游山玩水,当然隐含着许多复杂的时代、社会和历史原因,但是,属耳流目的感性追求,能产生生理快适与心理愉悦,也当是重要的因素。

基于以上原因,学界一般认为把高山大川作为自然美来观赏完成于晋宋六朝时期,此时,“人们对自然的观念趋向成熟”<sup>①</sup>。山水文学“兴起于魏晋,成熟于南北朝”<sup>②</sup>。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魏晋以来,虽然玄学家从思辨的角度讨论言意、形神等问题,宗炳提出了山水“畅神”(《画山水序》)理论,但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的审美实践,就会发现人们更注意和沉醉的是茂林修竹、清流激湍、莺鸣燕语等物的外在形式,属耳流目,游目骋怀,主要为的是“极视听之娱”,为的是感官娱乐。《列子》一书,今已公认为魏晋时所作,其中《杨朱》篇宣扬的纵欲肆志,追求感官享乐,可视为贵族文士纵酒放诞、属耳流目的理论说明。这种娱生恣体

① 石夷《从“望秩于山川”到“悦山乐水”》,《复旦学报》1985年第1期。

② 崔承运《试论山水文学的兴起及原因》,《学术月刊》1985年第5期。